

促进学术国际传播 建设江苏对外美好形象

——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外国文学专场综述

2018年11月23日,由省外国文学学会主办、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承办的江苏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外国文学专场在盐城师范学院召开。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盐城师范学院校长方忠、副校长毕凤珊出席会议,省作协副主席叶兆言,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何成洲、王守仁教授,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薛家宝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杰、许诗焱教授,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程爱民教授等作主题演讲。来自省内各高校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就“外国文学研究与江苏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展开研讨。

“江苏外国文学学科实力雄厚,江苏外国文学学会自成立以来,围绕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以及建设江苏对外美好形象做了大量工作,推出了一系列重要作品,为江苏对外国际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徐之顺在讲话中指出,学术理论界和文艺创作界需要确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处理好中学和西学、当代和传统的关系,从江苏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汲取营养,将其有效地转化为学术研究资源和现实作品,为江苏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社科事业的发展提供智慧源泉,为建设一个更加开放、文明的新江苏贡献力量。

在跨文化视域中构建特色话语体系

在学术全球化时代,如何推动中国学术研究

走出去,在跨文化视域中构建具有本土特色和江苏符号的文学学术研究话语体系,是外国文学工作者担负的重要使命。

学术走出去是一个系统工程,与会学者认为,在国际刊物发表论文、在国外出版社出版著作、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在国际主要大学演讲和交流、参加或者主持国际合作项目、参与国际性学术机构、在国际性期刊和丛书担任编委、和国际性大学合作开设课程或者合作培养博士、硕士等都是这个系统工程的重要内容。学术研究需培养中国问题、比较问题和前沿问题意识,学术理论创新则应建构从本土经验出发的有新意的理论范式,从理论交叉中获得创新的思想模式,提出有新意的理论观点。

与会学者提出,跨文化视域下的文论话语体系是在长期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及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多元化是它的归宿。长期以来,西方哲学或文论“一分为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直接影响了我国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发展,甚至让我国文学界渐渐丢失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整体性和感悟式文本意义把握等优良传统。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构建需考虑情感因素,在“规律性”与“反规律性”之间展开,辩证处理“整体性”与“局部性”之间的关系。

外国文学改革开放40年发展,其先后以反

传统的话语、政治革命的工具、观看外部世界的窗口三种不同的角色参与中国社会变革，对中国社会现代价值观的形成与确立直接或间接产生了影响。未来的外国文学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导向，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江苏外国文学的研究优势在于有比较多的具有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具有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为支撑的研究能力和水平，拥有译林出版社、《当代外国文学》等专业的出版社和期刊，应当在推动中国外国文学创新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

从单项输入到双向交流，在互动中彰显文化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彰显了非常高的开放性和包容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学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和价值更为凸显，中国读者对于外国文学更是始终保持着极高的需求度。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每年翻译出版如此大规模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没有哪个国家的读者像中国一样，阅读如此多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这大大催生了外国文学翻译市场的繁荣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国内参与版权竞争的出版机构和工作室已达到近三万家，越来越多出版机构开始注重外国文学这片领域。

在输入外国文学作品的同时，江苏作家作品的对外翻译、出版、传播及其影响力问题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少优秀的文艺作品已经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广为传播，并在传播形式上从最初的“单项输入”变为现在的“双向交流”，在互动交流中彰显出更大的文化

影响力。江苏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江苏省作协、南京师范大学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全英文期刊《中华人文》，正在成为中外文学平等对话、双向交流的重要桥梁，未来30年可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译介期刊。

在持续的文学作品翻译传播中，江苏的城市形象逐渐在海外形成，同时还存在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一份针对江苏省公共服务领域英语使用监测与研究项目中的调研显示，江苏在城市英文网站这一对外窗口建设中存在英文翻译不够专业、无监管、不重视问题，跨文化能力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

江苏文化“走出去”需要探索新路径

江苏对外美好形象的建设、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外国文学的高质量发展。推动江苏文化、文学有效地海外传播和国际互动，需要转变思维、创新路径。

大数据时代带来了国际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应从新闻学的角度入手，从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受众和效果层面对照江苏省情来研究和优化相关要素，推进江苏和海外的交流合作。在政策制度层面，应建立起政府部门、媒介机构和民间力量的多主体工作机制；有针对性地梳理文化资源，丰富传播内容；利用好出版物、高校、学者、学生等多种传播渠道；明确受众关注点与兴奋点，在对外交流过程中贴合外国受众的思维与生活，实现传播效果。

本次外国文学专场评选出在江苏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奖18名，科研成果奖一等奖23名，二等奖27名，优秀奖55名。

传承江苏文脉 弘扬大运河文化

——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文学与历史学专场综述

2018年12月8日，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江苏师范大学承办的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文学与历史学专场在徐州举行。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省社科院党委书记、院长夏锦文，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江苏师范大学校长周汝光，徐州工程学院原副院长张仲谋等出席会议。夏锦文、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南京师范大学陈书录教授、南京大学徐雁平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如何认识和理解大运河文化》《运河与江苏文化》《大运河文化与明清江苏文学》《在多重文化关联中探究“江南性”》的学术报告。来自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8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传承江苏文脉，弘扬大运河文化”的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会议由江苏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岑红主持。

梳理文脉资源，把握文化脉搏，彰显文化自信

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从吴越文化到淮扬文化再到楚汉文化，江苏文脉“一本万殊”、源远流长，孕育了独特的苏味文化形态。2016年，江苏启动了“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拟通过10年的努力编辑出版《江苏文库》（包括纸本与数字版），其中纸本规模3000册左右。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启动实施“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全面梳理江苏文脉资源，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支撑江苏文化发展迈上新台阶，彰显了当

代江苏人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意识。

“江苏文脉守护着全体江苏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肩负着文化凝聚、文化传播、精神认同的强大功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金陵画派’及其美术思想理论是江苏文脉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当代画家傅抱石就是其中的典型。”南京师范大学吴振韩认为，在江苏文脉的历史长河中，傅抱石是近现代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的拓荒者。他从不孤立地研究“图案”“工艺美术”，而是将其纳入美术史研究的整体视域。他的工艺美术思想集中体现在历史文化底蕴、民族精神指向、综合汇通方法、社会实践诉求等方面，对运河沿岸民间工艺美术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

文化和艺术密不可分，艺术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从艺术学的角度看，江苏文脉涵盖小说、戏剧、音乐、舞蹈等各种艺术门类。江苏理工学院张春歌以洪深戏剧思想为例提出，洪深坚持跨文化语境中的民族主义立场，主张戏剧应具有“中国情调”，即戏剧要积极表征和弘扬中国文化、中国精神。无论是早期关注社会人生的戏剧，还是反映抗战时期的戏剧，其作品的思想主旨与艺术风格都透露出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情调”的提出，对于思考如何实现戏剧的中国化表达、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仍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运河文脉是“江苏文脉”的重要线索

千年大运河从北京到浙东，串连起了多样的中华传统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文脉系统。运河文脉是“江苏文脉”的重要线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传承江苏文脉的有效途径。作为大运河开凿历史最早、文化品位最高、代表性标志最集中和目前尚在使用里程最长的省份，江苏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动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要站在文化强国、文化强省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大运河的历史、现实、未来，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助推大运河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大运河的开凿和持续运行形成了漕运文化。淮阴师范学院吴士勇认为，漕运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治水、开河与通漕制度历史逻辑的金钥匙。从历史发展来看，先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后有因治水而孕育的水利社会。随着历代政治中心和基本经济区不断分离，以及王朝集权政治的不断发展，运河得以开凿，各地漕粮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漕运及漕运制度应运而生。漕运的制度化归于运河的政治化，这不仅表现为运河与漕运职官设置日趋完善，还反映在中央政府全力动用政治资源奉漕。

大运河江苏段集中了全省大部分优质旅游资源，文化旅游资源品种丰富、品位高雅，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做好开发、利用工作。中共苏州市委党校赵志浩认真考察分析了大运河江苏段文化遗产现状并提出，应通过加深对大运河文化带重要意义的认识、加强大运河保护工作

的法制建设、优化完善大运河功能布局、开发优化大运河旅游项目等创新性举措，推动形成大运河江苏段文化旅游互惠共利的格局。

江苏文脉与大运河文化应实现“并蒂花开”

大运河江苏段是江苏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空间场域，对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江苏文脉与大运河文化交融互渗，大运河文化促进了南北文化融合，孕育了江苏文脉；江苏文脉流淌着大运河文化的基因，丰富了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会专家表示，要以江苏文脉涵养大运河文化，以大运河文化哺育江苏文脉，努力实现“并蒂花开别样红”。

“运河与城镇自古便构成了‘命运共同体’”。扬州大学王旭以邵伯即今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为例谈到，邵伯的兴荣盛衰与大运河息息相关，地域文化由此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邵伯航运地位的提升，始于唐而发展于宋，对其水情、水利工程和市镇经济的考察梳理，可深化人们对淮扬运河及漕运文化的认识，一条河尽显江苏文化之美。

运河文化催生了运河文学。盐城师范学院滕汉洋认为，始于唐代的隋堤柳吟咏，就是唐人借助运河这一特定文化场域表达历史意识和现实关怀的典型诗歌主题。唐人赋予隋堤柳以“亡国树”的基本内涵，不仅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文学中的柳文化，也为后代的运河怀古文学开启了一个极具价值的主题。隋堤柳是由唐代运河交通所催生的文学意象，与中晚唐时期通济渠、邗沟运道地位的巨大提升及由此带来的运河怀古热潮密切相关。

“江苏文脉研究和整理工程将比较系统地

江苏上古以来到1949年的文化典籍进行整理和研究，它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大运河文化重叠的，这也正是开展江苏文脉工程的意义所在。”江苏师范大学王怀义认为，江苏文脉研究和整理工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传承创新大运河文化，推动大运河从“地理空间”走向“文化空间”。

在与会学者看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不仅是一个实践工程，也是一个学术理论研究工程，还有很多思想理论、历史文化上的疑难问

题有待进一步研究。面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这样一个时代课题，全省文史领域专家学者要把握机遇，借势借力，从多学科、多角度开展研究，努力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动学科创新，推动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此次会议共征集论文130余篇，经大会学术委员会评审，评出获奖论文39篇，其中一等奖12篇，二等奖27篇。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温德朝）

新时代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

——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专场综述

2018年12月11日，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省中特中心常州大学基地承办的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专场在常州大学举行。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常州大学党委书记陈群出席会议并讲话，常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戴国洪主持开幕式，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主持会议讨论环节，来自江苏社科界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挑战

当代各种社会思潮错综复杂，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脉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新语境和互联网新媒体发展也使一些新问题逐渐显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的必

要性更加凸显。对此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社科理论界要把准时代脉搏，明确使命担当，围绕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这一重大课题，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明确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挑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些国家片面强调的‘网络自由’是‘自由’的异化，其实质是霸权主义在当今社会的延伸、国家利益的扩张和监控全球的网络包装，其目的在于以渗透的形式称霸全球。这给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传媒大学赵欣论述了“网络自由”渗透背景下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构建相应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预警和反馈机制，增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提高我国科

技实力的同时,注重提高网民网络素养,识破“网络自由”的真正面目,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常州大学李昊远认为,新时代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面临三重语境:一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斗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世界语境,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多样意识形态共存的中国语境,三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对新挑战的网络语境。他表示,要从这三种语境出发,深入领会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科学内涵。

与会专家认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必须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文化基础,这是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遵循。

理论与实践结合,打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基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只有追根溯源,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引领之根及其话语权建构之道,才能为增强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打好理论和实践基础。

南京邮电大学史献芝、季国平提出,基于普通社会公众视角审慎地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恰切之道,既是一个迫切的理论和实践议题,也是一个关涉国家未来命运的重大时代命题。基于普通社会公众视角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要抓住基本要点,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大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不断优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手段和结构。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引领是制度自信之魂。”泰州学院周建超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其科学性、真理性、人民利益观、公平正义价值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灵魂。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创新完善和获得自信的根本保证。新时代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充分发挥其先进性的价值功能,掌握其主导权话语权的制高点。

强化社会治理合作,推动新时代意识形态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常州大学沈杰认为,社会治理合作是基于共享裁量原则,尊重社会意愿和民众偏好,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资源进行整合、使双方得到优势互补的一套模式和流程体系。共享裁量权是社会治理合作的本质要求。生产、收益和偏好等三种裁量权在裁量权谱系中合理分布,放大治理优势,降低治理风险,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可以使合作治理具有合法依据、良好的治理绩效和较高的社会公共价值。

借助特色文化资源推进大学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建构,更需要传承。在与会学者看来,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大学校园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在大学中传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将大学育人与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相结合。

高校是社会思潮的集散地和意识形态前沿阵地,青年是各种社会思潮的易感人群,大学校园往往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桥头堡。与

会学者表示，大学应牢牢守住意识形态主阵地，切实地提升思想认识，充分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坚持问题导向，完善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问题分析、研判制度，准确把握思想动态，建立风险防控机制，运用网络新媒体强化疏通和引导。持续完善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深入推进思政课综合改革，积极探索条块结合、分解细化、落实到岗、量化到人的管理机制，形成层层落实的工作局面。

培育新时代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高校责无旁贷的紧迫任务，大学生志愿服务是高校育人的重要途径。南京工业大学陶然提出，在引导学生体悟与内化志愿精神的过程中，应紧扣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与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弘扬进行有机对接、融合，以创新驱动为内核，以人

文关怀为主线，以独立思辨为特质，实现大学精神在大学生志愿服务中的实然“在场”，全面建构志愿精神与大学精神协同育人的实践理路。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王浩谈到，“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是从常州走出的优秀革命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常州三杰”红色名人资源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一种可行的路径是探寻“常州三杰”红色名人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模式与策略，对其加以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充分挖掘其蕴含的精神内涵，彰显其当代影响力和教育价值。

本次学术聚焦专场共收到投稿论文 90 篇，经学术委员会评审，评出获奖论文 30 篇，其中一等奖 10 篇，二等奖 20 篇。

（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曹琳琳）

新时代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变革

——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政治与法学专场综述

2018年12月14日，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区域行政法治发展研究平台承办的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政治与法学专场在南京举行。来自高校、党校、科研院所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理论创新与社会治理变革”的主题展开研讨。南京审计大学校长刘旺洪、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孔繁斌、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金太军分别作了题为《信访的法律治理》《改革开放四十年依法治国的回顾与展望》《政府职能转变：国家治理变革的中国理论》《社会治理的重点场域》的学术报告。

法治提升发展核心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和重要保障”，并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重大命题，为新时代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江苏在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一直紧抓法治政府和法治江苏建设不放松。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首次将“核心竞争力”一词用于诠释法治与发展的关系，提出“让法治成为江苏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法治政府和法治江苏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比如，推动县级以上党政机关设立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推进重点领域地方立法和立法信息公开，创立“不见面”审批（服务）新模式，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强地方特色法治理论智库建设等等。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发展道路，一方面应以中国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为立足点，科学合理地对待和借鉴外国文化，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做出新贡献；另一方面还应该关注本地区的特殊问题，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东南大学副校长周佑勇表示，“理论创新与社会治理变革”这一主题，秉承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研究进路。贯彻这一主题要求，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理论创新促进法治实践变革

理论创新是完善社会治理、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与会学者表示，应认真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历程，系统总结其成就和经验，以中国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为立足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积极推进法学理论的创新。国有自然资源权利配置本质上属于重大行政决策过程。“此过程，深刻涉及自然资源利用和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和谐，涉及资源权利的效率和公平、私益和公益的平衡等问题，需要公众参与机制介入其中以促使公共决策的民主、科学。”淮阴师范学院张牧遥表示，对国有自然资源权利配置之公众参与权这一行政法上的公法权利的诉权保障不能采取“一刀切”模式，而应区分公众参与的类型层次，对那些实质性公众参与权配给诉权，并且这种诉权的表现形式指向了公益诉讼。苏州大学程雪阳则关注到“当前我国自然资源资产制度改革思想”研究，他提出，国有自然资源所有权应按照“所有者与监管者分开”的原则，授权给不同层级的政府特设机构统一代表行使。此后，中央与地方行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特设机构，应在区分“经营性国有财产/公益性国有财产”的基础上，按照“混合所有制改革”原则组建或委托具体的企业来经营和管理“经营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从而实现中央与地方在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利益上的均衡和共享。

在立法过程中，究竟谁在表达意见和主张利益？东南大学于立深从微观立法学的研究视

角提出，有必要全面展开微观立法学的四个进阶：本色研究、规则研究、行为研究、类型化研究。分析立法过程中的信息收集和交换程序的法理基础和主要形态，即座谈会、调查研究会、专家论证会、听证会、公众参与；剖析立法过程中意见和利益沟通的具体形态，即辩论、对话、协商、妥协、审议和表决等立法微观机制的展开程序和过程，从而达到立法民主与立法质量的高度融合和高品质转化。

除了法治理论的探讨，学者们还关注到民生法治的问题。东南大学顾大松针对路内停车问题展开充分调研，构建了法治视域下“三位一体”路内停车协同治理模式，他认为，从交通法理上讲，停车是行车的一部分，但是要明确其在机动车道路上停车是临时停车。针对路内停车的收费，是公平原则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但收费不一定要高，如能控制停车的临时性，收费可以低。

为社会治理体系创新贡献江苏智慧

近年来，江苏率先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变革，首次提出并施行“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建成全国首个省级“社会治理大数据中心”，多层次探索“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等，全方位、多领域打造社会治理的江苏模式，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提供借鉴。

与会学者表示，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是当下中国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首要目标，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在促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变革方面应有所作为。东南大学靳力提出，以新时代价值为内核，以改革进程中的问题为切入点，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优化公共治

理机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随着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各类社会问题涌现，社会治理体系变革的基础在于创新性回应现实问题。东南大学季玉群认为，社会治理变革是世界趋势，但问题意识具有本土特色。中国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人口老龄化，老龄化伴随着中国的政治进程，从国家主导型的范式发展到多元博弈的范式，呈现文化、人际关系、代际关系等多元变化，超越了当前财政经济、社会伦理的单一范畴，亟需理论创新，化解社会难题。

跨区域水环境治理、生态危机等现实问题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南京财经大学詹国辉从权力共治、责任整合以及主体协调等维度系统性考察了“河长制”治理模式的内在运作逻辑，他认为，应当建构出信任机制、维护与整合机制、协调机制以及反馈机制等“四位一体”的路径选择，以提升跨区域水环境的治理质量。南京工业大学张仲涛则表示，生态问题本质上就是利益矛盾冲突问题，以人与自然协调关系为核心的生态正义可以较好地平衡生态问题与人类利益关系，而政治协调是实现和维护生态正义、协调利益矛盾、化解生态危机的重要实现方法。

此次会议征集论文90篇，经大会学术委员会评审，评出获奖论文27篇，其中一等奖9篇，二等奖18篇。

改革开放40年社会变迁与社会学发展

——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专场综述

2019年1月18日,省社科联主办、南京大学承办的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专场在南京举行。南京大学常务副书记杨忠和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成伯清、党委书记徐榛出席并主持会议。来自国内近10所高校的20位学者围绕社会变革与政治社会学、中国青年的历史蜕变、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等展开深入研讨。

改革开放的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堪称世界奇迹。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动: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转移、观念转变,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徐之顺表示,这些变化,一方面为我国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素材,另一方面,也迫切要求社科工作者特别是社会学者勇于探索重大现实问题,提出新理论、新观点,促进学科的创新发展。

杨忠提出,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是社会学的核心主题。在我国,伴随着市场化、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社会分化和不平等风险有所加大,差异多元的生活形态以及价值观念时常引发争议,这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也为社会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立足中国社会转型实践开展研究

与会学者认真研讨了改革开放40年社会变迁对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以单纯追求物质层面的经济发展为中心,慢慢演化为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变革为中心的转型社会,同时,又开始在某些方面迈向了以社会文化和人的心理情感为关注点的社会文明建设。立足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转型社会学研究,通过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学科自主性具有重要意义。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意义,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是一场有方向的社会转型:一些新的组织类别、社会身份及关系结构出现,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大规模重组;这一重组的基本方向,是从全面的行政再分配组织体制中,生长出了资源分配的市场组织体系。中国社会变革独特性在于,旧的单位组织级别和对资源分配体制的影响并非是单向的。多数人从这场变革中受益,他们欢迎改革中出现的新型价值原则,这是变革获得广泛社会支持、具有持续动力的基本原因。

与会学者提出,中国处于单位制解体但未完全解体的后单位社会,中国由界别社会逐步转变

为界别组织和社会组织混存的社会，城乡二元社会处在加速消解的途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形态变化的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关系得到进一步调整。

关注变迁社会的代际互动和代际关系

与会专家认为，在一个日益跨越边界的、充满流动性的世界里，中国社会学不应该只关注那些日益僵化的社会秩序和固化的社会发展路径，而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各种跨越社会边界的现象。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开始处在技术社会之中。正是技术尤其是生活中的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GDP的增长，消费主义的来临以及全球化对13亿中国人民的单纯的物质意义，使得这场大变迁有可能改变两代人的处世样态和生存方式，并使年轻一代有可能呈现出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由此最终改写我国周而复始的历史。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探讨青年的价值与社会意义，探讨青年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探讨变迁社会的代际互动与代际关系，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构建新型的社会体制和管理机制

经过40年经济建设，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经济要素的安排转为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社会领域的制度设置还比较落后。社会体制的改革成为当务之急。构建新型的社会体制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三者各司其职，相互协同，互为补充，形成合作共治的新型格局；第二，健全公

共产品供给体制，对于基本的公共产品，政府应当托底，对于可选择性的公共产品，超额部分应当由市场供给，社会尽可能提供选择的机会；第三，完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第四，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机制，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在于建立一套好的市民化机制，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供给；第五，推动社会组织的培育、改革；第六，完善社区建设体制，在基层分清哪些是政府的分内事，哪些应由社会来承担，哪些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解决，双方分清事务，明确责任，协调做好基层事务；第七，构建现代社会结构，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是人群结构的“橄榄型”形态，即中产阶层占多数，因此要从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数量着手，改变劳动者收入特别是生产一线劳动者收入偏低、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过小的现状，从而实现“工资收入应是劳动者的主要收入”的目标；第八，创新新型城乡管理体制，城乡二元化的制度设定尚未根本改变，重城市轻农村、抽取农村的资源向城市转移的做法仍在继续，因此，要根本改变实施了几十年的重城轻乡、城市与农村“两策”的社会政策，按照现代化的理念，设计新型的城乡管理体制，真正形成城乡协调、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的崭新格局。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朱安新、薛无霜）